

# 当代汉语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的 生成动因和机制\*

王伟超 施春宏

中国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要** 本文考察“妖魔化中国、潜规则女明星、传帮带青年教师”这类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这类现象与韵律句法的重音指派条件相违背，但在当代汉语中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异现象。文章在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描写的基础上分析其生成的动因与机制。其产生的动因包括构式形义匹配的一致化、信息加工方式的经济性、特定语境下语义语用的契合及外语表达的影响。而其产生的机制，则与韵律因素对语义语用因素的作用、语义语用因素对韵律因素的反作用、韵律与词法的再调适过程等多重界面互动过程有关。文章还讨论了这一现象扩展的限制问题，并借此指出对边缘现象进行分析具有特定的语言学意义。

**关键词** 三音节动词 动宾构式 韵律句法 互动关系 动因和机制

## 1 引言

在汉语句法系统中，一般情况下，及物的动词性结构带宾语的合法性受到音节数量的制约，三音节(及以上)的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它们的客体论元(受事、对象等)如果需要与动词共现，必须到动词之前寻找句法位置，同时常常带上论旨角色的相应标记形式。如“简单化复杂问题、丑恶化领导形象”这些表达一般认为是不合法的，必须变换为“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领导形象丑恶化”之类的表达方式(周韧 2010)。

关于三音节动词不能带宾语这一现象，首先是在“化”缀动词(指带后缀“化”的动词，如“格式化、妖魔化”)的考察中受到关注的，因为它与双音节“~化”动词的句法功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简化复杂问题、丑化领导形象”是合法表达。郭潮(1982)、刘建建(1994)等较早地在针对“化”缀词的专项研究中指出了这类词语句法功能实现的音节数量限制。

韵律句法学的创立和建构，使得韵律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得到了更为系统的关注。

\* 本课题得到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培育计划资助项目(双一流引导专项经费)(项目批准号17YPY059)和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基于多重互动关系的语法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的支持。修改过程中蒙蔡淑美、邱莹、李娜、刘卫强、张苗苗、李聪、罗斐、张子豪、刘星宇、奚柳青、任喆远和阿琪莎等先生赐正。谨此一并致谢。

董秀芳(1998)首先从韵律制约句法的角度论证了“他打粉碎了玻璃杯”这类三音节动补结构带宾的不合法性。冯胜利(2002)通过对三音节动补结构和三音节动宾结构不能带宾现象的分析,指出只有句法运作所造的最小词(minimal word)才可以作为重音指派中的最小成分,从生成机制的角度对相关现象的合法性做出了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概括。周韧(2010)将三音节“化”缀动词不能带宾的现象与先前关注的三音节动补结构不能带宾的现象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统一从“中心词移位”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这一类现象是大于音步的单位不能进行中心词移位所致。对于这一类现象,冯胜利(2011)结合“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这一韵律句法的核心概念,提出了如下重音指派的词体条件:“核心重音的指派都必须遵守核心重音指派者的最大极限条件,亦即,必须等于或小于‘最小词’,这就意味着,词体大于两个音节(最小词)的动词,无论是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还是句法词,均无法携带外加宾语。”从而明确了各类三音节(及以上)动词性结构不能带宾语的现象的约束条件。

综上所述,学界普遍认为,韵律因素是制约动宾格式形成的条件之一,韵律对句法的作用,使得“简单化”等三音节动词无法带上宾语。

然而,我们也发现,在当代汉语实际交际中,存在着三音节动词带宾语的用例。例如,在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有如下的表达方式:

- (1)上公开示范课, 传帮带青年教师。(《“一期两步”为当地送上“及时雨”》,《中国教育报》2002.3.28)
- (2)由于自己涉嫌性骚扰下属,他将从即日起暂时离职,但他否认对他的指控。(《以政坛丑闻不断》,《文汇报》2000.4.4)
- (3)随后打开电脑准备演示,就听见台下有人喊:“格式化 C 盘,回车!”(BCC 微博语料)
- (4)实际上,美国某些人多年来一直以妖魔化中国为己任。(《从麦卡锡到特鲁洛克》,《人民日报》1999.9.1)
- (5)当然也生无可恋,以潜规则女明星为乐为生趣。(BCC 微博语料)
- (6)这是一款用于反编译 net 开发程序的工具。(BCC 微博语料)

作为一类新异现象,三音节动词带宾的用法在汉语中尚未完全稳固,但此类违反重音指派条件的现象已然广泛见于多类三音节词语,甚至其中一些词语的带宾用法已成为常态(如“妖魔化、格式化、潜规则”)。可见,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现象,不宜视为个别使用者的偶然误用,而是当代汉语正在发展之中的一类新异现象,它体现着韵律之外的因素与韵律因素的竞争互动关系。本文便试图在系统描写的基础上对这一新异现象的产生动因、生成机制做出探讨。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BCC)、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CL),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语料库(MLC)以及其他书刊和网络搜索。部分语料库中搜索得到的存疑语料经核对原文进行了校正。

## 2 带宾三音节动词的类别及表现<sup>[1]</sup>

当代汉语中,可以带宾语的三音节词语主要为及物的三音节动词,按照构词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另外还有一部分三音节名词也可以临时借用为及物动词而带宾语。为了说明方便,这里统称为“三音节动词”。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词”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标准,而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三音节词,是指作为句法运作的单位的句法词。对于句法词的界定,则以“词汇的完整性原则”为依据:“短语(句法)规则不能影响(或适用)到词汇内部的任何部分。”(冯胜利 2001)

可以带宾的三音节动词类型具体如下:

第一类:“1+1+1”式及物动词。这类动词由三个单音节的、可独立构成及物动词的自由语素并列构成。例如:

- (7)可是在9月15日那一天,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不约而同出现了一些暴徒,一个是打砸抢日系车,还有所谓的砸日本料理等等。(《何亮亮:中国钓鱼岛战略已从被动变主动》,凤凰卫视《时事开讲》2012.9.20)
- (8)新中国大规模镇反“杀关管”了多少反动分子(文章标题,《看历史》2010年8月刊)
- (9)新疆阿勒泰草原有一支援疆医疗小分队,常年奔走在偏远农牧区,坐诊,巡诊,传帮带乡村医生,被誉为草原医疗轻骑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2011.11.1)

这类三音节动词表达的是一个固定化的整体概念,无法拆开,如“传帮带乡村医生”不能说成“传乡村医生,帮乡村医生,带乡村医生”,因此在句法上,它们属于复合词,区别于并列短语。

第二类:“1+2”式及物动词。这类动词由可独立构成及物动词的双音节语素组前加起修饰、限制作用的单音节语素构成。例如:

- (10)在真空热处理铁镍高温合金时,由于该类合金在400℃以上,表面有较强的吸附力,因此要求真空炉内绝不能有锌及油漆一类污染物。(呼延新岗《真空热处理炉内污染分析及清除措施》,《工业加热》2000年第5期)
- (11)用NOS抑制剂预处理动物,使NPFf诱发戒断样症状剂量依赖性降低。(臧梦维、刘景生《NO-cGMP信息通路在阿片类药物耐受和依赖中的调节作用》,《中国药理学通报》1999年第2期)
- (12)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费用。(冯宝兴《关键在判定私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在私营企业主应否评选劳模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
- (13)在加密软件发展的最初阶段,各开发者往往使用自定义的加密算法,并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防止别人反编译加密软件及对加密软件进行跟踪上。(孟雄

晖《解析加密软件》，《中国计算机报》2002.6.3)

(14)从1993年第一次曝出性骚扰男童的案件以来，迈克尔·杰克逊的事业就不  
断下滑。(《“流行天王”杰克逊无罪释放》，《文汇报》2005.6.15)

(15)联合国将成立监督委员会，加强内部管理的监督，并严惩性侵犯妇女的维和  
人员。(《安南与全体职员对话》，《文汇报》2005.4.7)

“1+2”式动词的构词法是汉语中新兴的一类构词法，有些词语由外语仿译而来。  
句法规则同样不适用于这些词，如“\*性严重侵犯、\*预重新处理”，因此同样属于句法  
词，区别于状中短语。这类动词主要为各学科的专业术语(如(10)——(13))以及社会生  
活一般领域使用的新词语(如(14)——(15))。

第三类：“2+1”式及物动词。这类动词由单音节动词性语素前加双音节修饰成分  
构成，目前仅发现“安乐死”1词<sup>[2]</sup>。例如：

(16)一般他们没人领养会安乐死狗狗滴！(BCC 微博语料)

(17)如果找不到领养的，主人说要安乐死它。(BCC 微博语料)

在BCC语料库中，“安乐死”一词的带宾用法仅在微博语料中发现上述2例。

第四类：三音节“化”缀及物动词。这类动词由双音节词根附加后缀“化”组成，  
带宾用例较多。例如：

(18)国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组织、媒体，有意“妖魔化”中国产品。(《在透明中  
重建信任》，《福建日报》2008.5.12)

(19)你真的能够最大化你的影响力吗？。(《李开复：追随我心》，中央电视台《面  
对面》2009.10.25)

(20)与菲亚特在这个竞争领域的合作可以帮助我们最小化单位成本。(《小车携手  
闯天下》，《文汇报》2005.11.15)

(21)弄错了对象，就边缘化了自己。(BCC 微博语料)

(22)他理想化中国农村，她觉得不过是怀旧，也都不去注意听他。(张爱玲《小团  
圆》)

(23)不坚持这一点，就不能发挥文艺的特点，就庸俗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号召，造成通俗文艺水平的低落。(老舍《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  
作总结报告》)

“化”是现代汉语中一个能产性较高的词缀。根据张云秋(2002)的考察，“化”缀  
词内部的语法功能不尽相同，只有一部分“化”缀词在语义上具有及物性，表现为可  
以较为自由地进入“把”字句；另一部分则相当于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如“工业化、  
女性化”)。显然，其中语义上及物的“化”缀动词才有可能出现带宾用法。

另外，该类词的带宾现象中存在着一些性质特殊的情况，其中的“化”缀词作为  
专业术语使用，其意义在特定学科领域中已专门化了。例如：

(24)这类病毒可以用任何方式攻击用户电脑系统，包括格式化硬盘、删除文件等

等。(《谨防新型图片病毒攻击》，《文汇报》2004.9.27)

(25) 喷墨打印机每启动一次，打印机都要清洗打印头和初始化打印机。(《喷墨打印机省墨秘笈》，《中国计算机报》2003.5.21)

(26) 再用 28mL 溶液乙酸化上述甲溶液。(于伯龄《绿色天然彩色棉金属盐固色实验》，《针织工业》2002 年第 1 期)

对于以上四类三音节及物动词，如果需要在主动句中与其客体论元共现而又不违背重音指派的“词体条件”，则需要借助介词构成客体论元前置式。而受事、对象等客体论元多可以用介词“对”标记，因此，常规情况下，多用介词“对”构成客体论元前置式。同时，为了韵律上不致“头重脚轻”，在“对”字句的谓语动词前一般需添加形式动词“进行”，构成“对……进行……”句式。例如：

(27) 故在沉积之前，必须首先对硅基片进行预处理。(舒兴胜等《氧气对 MWPCVD 制备金刚石膜的影响》，《真空科学与技术》2001 年第 7 期)

同时，“把”字句也可以起到在动词前安置客体论元的作用。但“把”字句的使用是有条件的，施春宏(2010a)指出，“把”字句是一种凸显结果的主动式。因此当需要凸显结果(如动词后存在表达结果的补语)而仍保持主动表达关系时，也可以使用“把”字句。例如：

(28) 即使强行把所有的输入数据 I 预处理到 $[0, +\infty]$ 的范围内……(徐永成等《新型 ART-2A 算法及其在 BIT 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振动工程学报》2002 年第 6 期)

及物性“化”缀动词自身就显示了动作的结果，因此一般可以直接进入“把”字句。例如：

(29) 今天，网络的发展把时间对人的制约作用最大化，把空间对人的制约作用最小化，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网络时代社会科学的使命》，《文汇报》2001.8.25)

(30) 全民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城市群中，而把农村边缘化。(《读书日能否拯救底层阅读？》，《福建日报》2008.4.23)

在一般“化”缀动词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当“化”缀动词表达的是结果符合动作发出者预期的有意行为时，则“使”字句的语义与“把”字句基本一致，这种情况下，客体论元也可以用“使”标记。例如：

(31) 这样，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努力使收益最大化。(《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文汇报》2003.11.2)

(32) 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边缘化，把女性变为规范之外的人和例外。(李银河《女性主义》)

以上两例分别大致相当于“把收益最大化”和“把女性边缘化”。

第五类：三音节名词临时借用为及物动词。例如：

(33)可是我就是潜规则窦文涛了。(《侃侃潜规则与性骚扰》,《锵锵三人行》  
2008.5.2)

(34)要找的朋友短消息我! (BCC 微博语料)

(35)你们觉得微信删掉一个人和黑名单一个人哪个更狠一点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3919309/>)

这类情况中,名词借用为动词,表达与名词相关的某种动作。如上述三例中的“潜规则、短消息、黑名单”分别指“利用潜规则强迫某人(与其发生某种关系)、给某人发短消息、把某人列入黑名单”。其中,“潜规则”的及物动词用法有常态化的趋势,其他名词多是依赖特定语境的偶然使用。

与前面四类三音节动词不同,这一类借用而来的动词,当需要与客体论元同现且表达主动的动作时,以使用动宾构式为常,而用“对”字句将客体论元前置的用法却较少出现<sup>[3]</sup>。同时,将名词临时借用为动词这一用法,具有非正式语体色彩,多用于如例(33)一(35)这类较为随意的非正式交际中。以带宾用法最为活跃的“潜规则”一词为例,对 BCC 多领域语料库的考察发现,“潜规则”的带宾用法只见于非正式语体倾向最强的微博语料,而在与正式语体关联度较高的报刊文本中,虽然“潜规则”一词也有一定的用例,但未见其借用为及物动词的带宾用法。

### 3 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产生的动因

如上文所述,三音节动词在与其客体论元共现时,常规情况下一般需要采取客体论元前置式以顺应韵律条件的要求。但同时,动宾构式作为汉语构式系统中既有的、表达“动作—客体”关系最基本的结构,在这一既有结构下违反韵律条件,通常并不会影响听话人的解码过程,仍然可以实现信息的顺利传递。因此,在特定条件的促动下,部分说话人仍然有可能选择动宾构式来为“动作—客体”的语义关系进行编码。

#### 3.1 构式形义匹配的一致化

根据 Goldberg (1995:67) 提出的“构式无同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 Synonymy),句法上不同的构式在语义或语用上必定不同。同样,动宾构式与“对”字句、“把”字句之类客体论元前置式在语义、语用特征上也存在差异。

在不受韵律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相比于“对”字句、“把”字句,动宾构式是表达“动作—客体”语义关系最常规、限制最少的格式,且动宾构式表达的意义,也是最为一般化的“动作—客体”关系而没有其他附加意义。因此,无标记的形式与无标记的意义构成了最自然的匹配关系。但当动词为三音节时,受韵律条件制约,一般的无标记“动作—客体”关系也被迫使用有标记的客体论元前置式来表达,此时,构式系统常规状况下的形式与意义匹配格局被打破,出现了“错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凸显其他语义的无标记“动作—客体”语义关系,选择动宾结构的形式,在违反韵律制约的同时,也是形式与意义回归无标记的自然匹配、且

与汉语句法系统常规格局保持一致的格式。因此,存在着促使说话人对由三音节动词构成的一般“动作—客体”关系向双音节的常规形式看齐而使用动宾构式的动力。

### 3.2 信息加工方式的经济性

如上文所述,对于三音节动词,一般的“动作—客体”标记也会被迫使用客体论元前置式,此时,使用客体论元前置式最主要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韵律条件的要求,而“对”字句或“把”字句的特殊构式义则并不凸显。故此时的“对”字句或“把”字句与动宾构式并不构成功能的对立。而在同样的语义下,与“对”字句或“把”字句相比,动宾构式在形式上更为经济,在信息加工中记忆负担较轻。这一点,也是促使部分说话人以违背韵律制约的代价而选择动宾构式的原因之一。

陆丙甫、蔡振光(2009)从短时记忆的限度这一角度对语言中的“动态组块”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代表某一瞬间记忆中的离散句法单位数的“瞬时块数”(instant chunk number, ICN)及代表平均每处理一个新单位时记忆中的离散句法单位数的“平均块数”(mean chunk number, MCN)这两个数值作为衡量组块难度的量化标准<sup>[4]</sup>,并据此从降低组块难度的角度对一些语言现象的生成动因做出了解释。用动宾构式替代“对”字句或“把”字句,同样是降低组块难度的过程。

例如,我们可对“他们妖魔化中国、他们对中国进行妖魔化、他们把中国妖魔化”三个表达进行组块分析,并将其瞬时块数、平均块数计算如下:(以词为单位,词末的上标数字代表处理到该词时记忆的“瞬时块数”)

[他们<sup>1</sup> [妖魔化<sup>2</sup> 中国]]<sup>1</sup>

$$MCN=(1+2+1) / 3=1.33$$

[他们<sup>1</sup> [[对<sup>2</sup> 中国]<sup>2</sup> [进行<sup>3</sup> 妖魔化]]]<sup>1</sup>

$$MCN=(1+2+2+3+1) / 5=2$$

[他们<sup>1</sup> [[把<sup>2</sup> 中国]<sup>2</sup> 妖魔化]]<sup>1</sup>

$$MCN=(1+2+2+1) / 4=1.5$$

由此可见,在这三种表达之中,动宾构式是平均块数最低的格式,这意味着在处理动宾构式时记忆的负担最小。

当三音节动词与其客体论元所组成的短语处于更复杂的结构之中时,选用动宾构式对组块难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我们以上述例(4)(为集中说明问题,此处进行适当简化)及其相应的“对”字句为例说明:

[[某些<sup>1</sup> 人]<sup>1</sup> [以<sup>2</sup> [妖魔化<sup>3</sup> 中国]]<sup>2</sup> [为<sup>3</sup> 己任]]<sup>1</sup>

$$MCN=(1+1+2+3+2+3+1) / 7=1.86$$

[[某些<sup>1</sup> 人]<sup>1</sup> [以<sup>2</sup> [[对<sup>3</sup> 中国]<sup>3</sup> [进行<sup>4</sup> 妖魔化]]<sup>2</sup> [为<sup>3</sup> 己任]]]<sup>1</sup>

$$MCN=(1+1+2+3+3+4+2+3+1) / 9=2.22$$

由此可知,当处于更复杂的结构之中时,使用介词“对”将客体论元前置,不仅使平均块数显著高于动宾构式,且由于句法结构的多层嵌套,当处理到“进行”一词

时,听话人记忆中的瞬时块数达到了动宾构式所达不到的4这一数值,而陆、蔡文中猜想“4”是一个“临界敏感点”,这一数值代表着记忆负担已经较大。在此情况下有着更强的选择动宾构式的动力。

### 3.3 特定语境下语义、语用的契合

如上文所述,不同的构式在语义、语用上均存在着差异。而在特殊的语境促动下,会出现动宾构式的某些具体特征比其他构式更契合表达需要的情况。

#### 3.3.1 焦点信息的凸显

使用不同的句法结构对动词及其客体论元进行句法配置时,必然会导致相关成分在句子线性序列中的相对位置的变化。而这一点,同时会影响到句子的信息结构。

一般而言,汉语句子信息结构的安排遵循“从旧到新”的原则,常规焦点为居于句末的结构单位成分(若动词带上宾语或补语,这个居末的宾语或补语即为常规焦点成分)。而另一方面,借助介词“对、把”等被前置的成分则往往具有一定的话题性,也即作为相对靠前的成分,在“由旧到新”的组织原则中表达谈话双方所共知的旧信息。

对于三音节动词,当说话人所强调的焦点恰为其客体论元时,如果顺应韵律的要求将客体论元实现为提前的介词宾语,则会造成句子信息结构与说话人欲传达的信息重点相冲突。而动宾构式恰可以在不影响语义识解的前提下,提供将客体论元置于句末常规焦点的位置的可能。因此,一部分说话者便可能以违反韵律要求为代价,选择可以凸显客体论元焦点的动宾构式。例如:

(36)目前,我省管道热处理还是采用落后的感应法,供电的电源一般使用电焊机调压,如遇大口径管道热处理时,就需数台电焊机同时进行调压,不但耗电量,而且转场移动不方便。省安装公司研制的这台调整器……按给定的升温曲线自动进行热处理,并录制曲线。每次可同时热处理两个管道焊口,工效比使用电焊机调压提高一倍多。(《管道热处理有了新“武器”》,《福建日报》1982.8.20)

该例意在通过对比体现调整器工效的提高。前文中“数台电焊机同时进行调压”显示了电焊机的工效之低,动作的受事“两个管道焊口”与之形成对比,因此是该小句中信息量最大的焦点成分。而“热处理”这一动作在前文多次提及,信息价值相对较低。故作者使用动宾构式将“两个管道焊口”置于小句末焦点位置。

另外,当需要对客体论元的数量进行凸显时,也只有动宾构式才可能将数量置于焦点位置。例如:

(37)长汀县招商引资……引进日本、德国先进的薯片、烘烤食品以及膨化涂层生产线,年可深加工农产品4万吨。(《长汀:品牌战略促进农民增收》,《福建日报》2006.5.9)

显然,该句意在凸显生产线的加工能力之高,“4万吨”作为意图凸显的大量,属焦点信息。因此,作者使用动宾结构将其置于句末焦点位置,若使用客体论元前置式,

则“4万吨”只能处在介词宾语的定语的位置上，无法成为自然焦点。

### 3.3.2 语体风格的和谐

按照语体语法的观点，“不同的语法或结构具有不同的语体性质和功能”（冯胜利2012）。而“对”字句这一格式，恰是具有鲜明的正式语体特征的一种格式。王景丹（2001）通过语料统计，发现“对”字句多见于公文、政论语体，而少见於文艺、口语语体<sup>[5]</sup>，这一结果，说明了它的正式语体属性。而动宾构式则为不同语体的通用格式，即具有“通体”属性。通常情况下，“对”字句和一般动宾句在语体上形成明确的分工。但当动词为三音节时，若需保证不违背韵律制约，则会因动宾形式的空缺，使得在非正式语体的话语中也只能使用具有正式语体特征的“对”字句，这一点会造成语体的不和谐。因此，这一点也会导致部分说话人使用动宾构式。例如<sup>[6]</sup>：

(38)人呢，狗日的人呢？我日你娘了你打砸抢脸谱马勺？！（贾平凹《秦腔》）

(39)唉呀呀！我们可是拍到你性骚扰我们社员的画面嘞！（谷川流《凉宫春日的忧郁》）

以上两例均为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例(38)与詈词同现，体现了说话人强烈的愤恨、咒骂；例(39)与语气词“唉呀呀、嘞”同现，属轻松随意的日常交谈。显然，这两例整体均具有较强的非正式语体属性。如果使用下例(38')、(39')中相应的“对”字句，则会因“对”字句的正式语体属性而造成语体风格的失调：

(38')\*人呢，狗日的人呢？我日你娘了你对脸谱马勺进行打砸抢？！

(39')？唉呀呀！我们可是拍到你对我们社员进行性骚扰的画面嘞！

因此，对于这类非正式语体的表达，动宾格式是它们最适宜的选择。

### 3.3.3 平列表达方式中的趋同效应

当三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构成平列表达，且双音节动词使用动宾结构时，出于形式简洁、匀称的需要，双音节动词的带宾现象有可能影响到三音节动词，使之向双音节动词靠拢。这种相近语义结构基础上的“看齐、拉齐”现象，往往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力。

当语义上平行并列的三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共享客体论元时，如果双音节动词采用带宾格式，则只有同时带上这一共享宾语，才能使用并列结构。例如：

(40)这六项本领的提出，大大深化和具体化了对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阎树群《和谐社会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

上例中三音节动词“具体化”的带宾，是与“深化”并列的需要。否则如果在“深化”使用动宾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具体化”符合韵律条件，则只能放弃并列结构及共享论元，构成如下表达：

(40')这六项本领的提出，大大深化了对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把(使)对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具体化了。

显然,例(40)这一表达,在简洁性与连贯性上均明显优于例(40')。

另外,当双音节动词与三音节动词各自与客体论元构成的短语构成并列关系时,说话人也有可能选用动宾构式,保持它们在形式上的统一匀称。例如:

(41)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郑敏《刍议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学理论》2008年第20期)

(42)艺术接受是化作品为我所有的过程,即阅读主体创造性实现作品和再生产作品的过程。(方厚霜、钟玉林《突破平面 走向立体》,《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21期)

在以上2例中,由于并列结构中居前的结构采用了最无标记的动宾结构(即“告别+NP”和“实现+NP”),故使得三音节动词“教条化、经验化、再生产”也借势带上了宾语,从而实现形式上的美感效果。

### 3.4 外语表达的影响

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格式的使用。周韧(2010)指出了三音节“化”缀动词不能带宾存在的反例之一“妖魔化”与英语翻译的影响有关。实际上,这一影响不仅限于“妖魔化”一词。当代汉语不少“1+2”式和“化”缀式三音节动词的带宾使用均与外语的影响有关。这两类中的大部分新词和术语均为由英语直接仿译而来,而由于英语中不存在动词重音指派的韵律制约,相应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带宾语均是最自然的常规形式,如“**demonize China**(妖魔化中国)、**sexually assault the actress**(性侵犯女演员)”。而汉英同属SVO结构语言,两种语言的动宾结构在形式、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故汉语在通过翻译文本引入这些词语时,在它们与客体论元共现的情况下,翻译者很容易用汉语的动宾结构直接对译英语的动宾结构,从而使这些三音节词进入动宾结构并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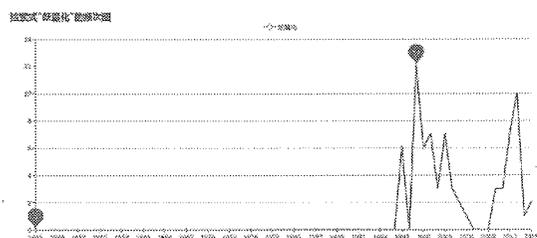
英语对这一结构的影响,较为鲜明的体现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汉语受英语的影响强度不同,因此不同时代引入汉语的三音节词语带宾活跃程度也不同,例如,及物性的三音节“化”缀动词有着相似的语义性质。但它们在带宾能力上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妖魔化、最大化”带宾的可接受度似乎高于“简单化、理想化”。

我们在CCL语料库中考察了部分及物性“化”缀动词的带宾情况<sup>[7]</sup>,由于各类“化”缀词在其他方面的句法表现上相近,故我们以带宾用例数在语料用例总数(包括带宾用例和非带宾用例)中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带宾用法活跃程度的标准。统计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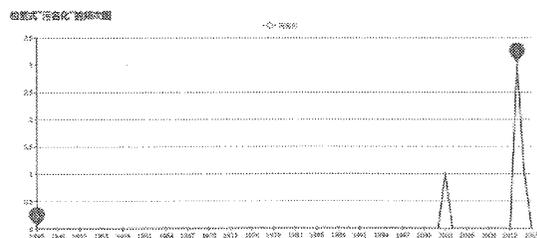
表1 部分“化”缀动词带宾用例统计

词语	带宾用例数	用例总数	带宾用例所占比例
妖魔化	36	90	40%
污名化	2	12	16.67%
最大化	28	1263	2.23%
边缘化	5	482	1.04%
庸俗化	2	228	0.88%
理想化	1	435	0.23%
标准化	2	3961	0.05%
简单化	0	903	0
教条化	0	58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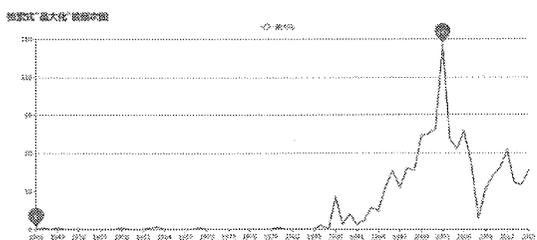
这一统计结果与上述语感相符。同时，我们利用 BCC 语料库的“历时检索”功能，对这些“化”缀三音节动词的出现年代进行检索，分别得出每个词语按出现年份统计的频次折线图，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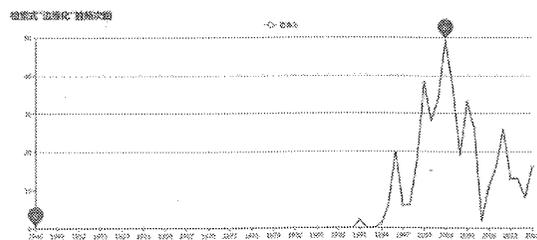
妖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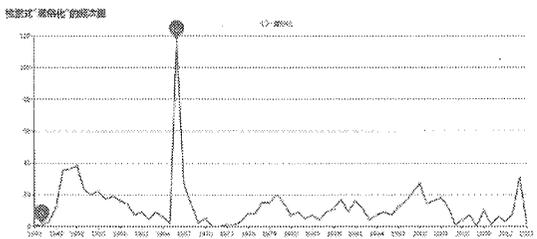
污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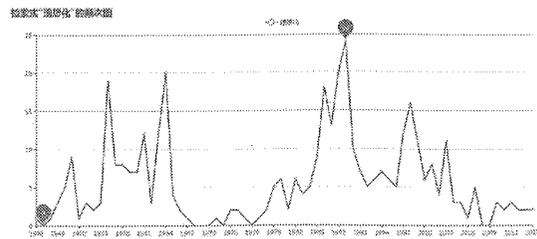
最大化



边缘化



庸俗化



理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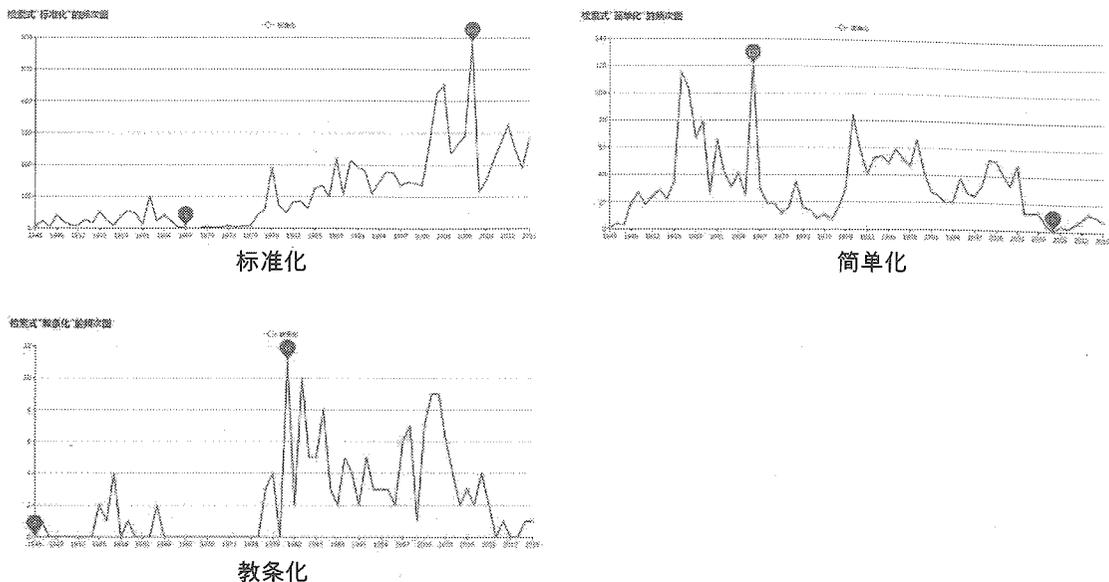


图1 部分三音节“化”缀词历时用例频率折线图

由上图可见,三音节动词使用的时代特征,与其带宾用法的活跃程度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带宾用法较为活跃的“妖魔化、污名化、最大化、边缘化”4词在改革开放前(20世纪80年代之前),从未出现或只有极个别的用例<sup>[8]</sup>,而在改革开放后(一般为20世纪80年代末~21世纪初)才突然涌现出较多的用例。而带宾用法相对较少的“庸俗化、理想化、标准化、简单化、教条化”出现较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有了—定数量的用例。

这一点,正是改革开放后,英语对汉语的影响程度加深的结果。由于改革开放后汉语社团与英语社团的深度接触,翻译文本大量出现,在它们的作用下,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因此这一时期开始大量使用的这部分词语在通过翻译文本引入汉语时,更容易将原文中与汉语句式系统相容的论元配位方式一并引入。

外语影响对三音节动词带宾用法的促动作用,还体现为这一格式在不同的语域中使用情况也有所差别。对CCL语料库中上述9个“化”缀动词的考察表明,在新闻报道语料中,这些“化”缀动词是否使用带宾用法与新闻所涉地域有一定关系,带宾用法只出现于有关国外及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中,而中国大陆的新闻中无一使用带宾用法。可见,与其他语言社团相关的新闻报道文本作为特殊的语域,更容易受到外语的影响。

#### 4 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产生过程中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

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违背韵律条件的新异现象的出现,是韵律因素与语义语用因素竞争导致界面互动的结果。这一互动,包含了韵律因素对语义语用因素的作用和语义语用因素对韵律因素的反作用这两个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同层面力量间的

竞争,导致说话人选择不同的构式对“动作—客体”语义关系进行编码。同时,在三音节动词带宾的表达形成后,可能引发韵律与词法的再调适过程。

#### 4.1 韵律因素对语义语用因素的作用

对于一般的三音节动词,它们在常规情况下与客体论元同现时,受韵律因素制约,强制进入“对”字句等客体论元前置式,这是韵律因素对语义语用因素作用的结果,属于构式形式特征导致的构式压制过程。

引发这一构式压制过程的原因是汉语词法与句法发展的不同步。对于汉语的韵律词法,冯胜利(2009: 174)曾指出“汉语没有三个音节的动词(包括形容词)”是汉语韵律构词法的特点之一。这一论断,适用于汉语固有的词汇系统。

而在句法方面,前文已分析,汉语动词与其客体论元可以实现为多种句法结构,这些论元结构关系相同、配位方式不同的若干句式可以归为一个“句式群”(施春宏2010a、2015a)。例如,当表达“张三(主体)—批评(动作)—李四(客体)”且表示主动的动作时至少有如下选择:

- (43)a.张三批评了李四  
 b.张三对李四进行了批评  
 c.张三把李四批评了

这些句式所构成的句式群都表达了“主体—动作—客体”这一底层语义结构关系,当其中的动词为汉语固有系统中的双音节词时,这些句式的分工完全是基于语义、语用条件的。如(43a)实现常规信息结构,(43b)凸显正式体特征,(43c)凸显结果等。

现代汉语中新兴构词法的出现,使得一批三音节及物动词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它们的语义结构决定了它们可以携带客体论元。然而,韵律句法的相对稳定性,导致由这些动词构成的语义上合格的动宾构式被“词体条件”所否定,为了对它们与客体论元的语义关系进行包装,只能在上述“主体—动作—客体”句式群中另寻出路,如前文所述,它们首先进入的是“对”字句等客体论元前置式。

而这些词进入句式群中其他的句式,并非是由于语义或语用选择的关系,而是在韵律因素制约下实现语义结构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句式间固有的形式意义对应关系。按照施春宏(2012、2014)将构式压制现象由功能、意义特征扩展到形式特征的广义理解,这一过程就是在韵律这一形式作用下发生的构式压制现象。在这一竞争之中,常规条件下使不同句式构成分工的语义、语用因素被韵律因素所征服。

#### 4.2 语义语用因素对韵律因素的反作用

通过上述构式压制过程,三音节及物动词得以借助句式群中的客体论元前置句式与客体论元共现,从而造成了句式群中三音节动词在不同句式中的分布的不对称,因而在动宾构式中出现“缺位”。

同时,对于动宾构式,由于重音指派的韵律条件完全属于形式一端,独立于其意义特征。在其意义方面,语义上及物的三音节动词与其客体论元仍然可以实现为该构

式的一个合法实例。所以,可以推断,不同于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格式,三音节动词的带宾格式仍然是一种具有潜在可能性的表达。而构式压制现象对句式群各句式形式意义对应关系的影响,以及经济动因的驱动或并列成分、外语表达的影响,均有可能促动部分语言使用者激活这一潜在的表达,以牺牲韵律合法性为代价换取更好的表达效果。这样一来,这些三音节动词就可以通过类推机制进入动宾构式。

这一现象,实质上是动宾构式在其意义(包含语义和语用)的促动下,构式形式发生的调变,动宾构式对组构成分形式方面的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宽。这一现象与当代汉语中动宾构式发生扩张的总体趋势相一致。赵旭、刘振平(2014)和李巍(2016)分别考察了在经济动因的促动之下,当代汉语中准双向动词向双向动词的演变和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两类现象。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看,以上两文所涉现象,均为当代汉语动宾构式容纳动词范围扩大的构式扩张现象。此两文中的构式扩张,体现在动宾构式对构件意义方面限制条件的放宽,而三音节动词的带宾现象则是形式方面限制条件的放宽。可见,动宾构式作为当代汉语中高频使用且形式具有经济性的基本格式,在形式、意义两方面均处在扩张的过程中。

在各层面因素的互动中,韵律语法学相关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韵律对其他层面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常被认为是无条件的。如冯胜利(2000: 69)对韵律对句法的制约条件曾有如下表述:“如果 $\alpha$ 与 $\beta$ 两个姊妹节点在韵律的规则系统中相互抵触,那么这两个节点必须加以整饬才能存在。”整饬手段包括改变句法结构、调整词的音节数量等。

然而,在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界面上,某些特殊语言现象并不需要优先满足韵律对句法的制约条件。如罗红昌(2009a、2009b)发现,被韵律句法规则所否定的“2+1”式动宾组合和“1+2”式名名偏正组合等形式,受经济性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仍然可以在语料中找到合法用例。针对此类现象,罗红昌(2009b)提出的“优选模型”将制约因素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组合因素”(符合句法组合规则)和“语义因素”(符合语义配合规则)属于刚性因素,而韵律因素则是与经济性原则等因素并列的“优选”因素,只有对刚性因素的违反才会导致相应结构直接被淘汰。罗文中的“刚性因素”实质就是保证语言表达可以被正确识解为语言系统中现有构式的实例的必要条件。而韵律因素由于不直接影响语义的可理解性,故相比句法、语义组合规则,韵律因素更有可能允许临时性违反规则的用例存在,即“特例”(施春宏 2010b),而这样的用法如果有其他动因的支持,便有可能常态化,进而成为新的规则,此时,“特例”便成为在一般规则之外、受其他特定条件制约的“例外”。目前,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正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至于“潜规则、短消息”等临时借为及物动词的三音节名词,其生成机制较为特殊。它们没有经历韵律因素主导的构式压制过程,而是因强势的语用动因压倒韵律条件,直接生成动宾格式的。

这类现象,实际是转喻的产物,即对于尚未编码为单个动词的动作,使用动作中一个凸显的参与角色进行指称。进行这一转喻过程的主要动因是追求表达的经济性。同时,此类格式作为临时的超常规使用,具有较强的非正式语体属性。而如前文所述,形式经济性、非正式语体特征与动宾格式的特点相契合。因此,这一转喻过程只能直接构成动宾格式,而基本不能构成“对”字句。以同类现象的双音节名词“短信、百度”(分别指“给某人发短信,用百度搜索”)为例:

(44)a.记得短信我。

b.\*记得对我进行短信。

(45)a.百度一下这个词。

b.\*对这个词进行一下百度。

因此,“潜规则、短消息”等三音节名词经历这一转喻过程借用为及物动词时,同样也会直接生成动宾格式。

#### 4.3 韵律与词法的再调适过程

对于部分高频使用的三音节带宾动词,带宾用法与韵律要求的冲突,作为新的不协调因素,会引发下一个演变过程,即将词形进行减缩以满足相应韵律条件的需要。例如:

(46)结果,结果我唯有格了C盘,狠心地装上一个无码的WIN7。(BCC 微博语料)

(47)钩纸肯定是潜了导演了!(BCC 微博语料)

(48)那种认为当官的思想就是不正当的想法,就是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官员,是在妖化官员阶层。(《游戏就是游戏》,《都市快讯》2003.4.19)

(49)美国大学体育教练性侵8名男童被捕(BCC 微博语料)

以上4例中的“格、潜、妖化、性侵”分别义同“格式化、潜规则、妖魔化、性侵犯”,为了使动宾式重新满足韵律的制约条件,发生了词形的减缩,且减缩后的词形与相应的语体特征相适应,例(46)(47)为非正式语体,减缩为单音词;例(48)(49)为正式语体,减缩为双音词。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韵律与词法的再调适过程。对于使用频率较高,减缩式同样能够激活动词原形的三音节动词构成的动宾结构,进行减缩后仍然不违背语义上的可理解性这一刚性条件。此时,便可以通过语音形式层面的删略,在保留满足表达需要的动宾构式这一前提下,重新适应韵律要求。它仍然是不同层面因素的不协调引发的界面互动的体现。

### 5 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扩展的限制

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现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韵律条件的制约,但这一现象的扩展仍是有限制条件的。

一部分动宾式的三音节惯用语在语义上也存在着客体论元,如“炒鱿鱼、拍马屁、穿小鞋、泼冷水、砸饭碗”。常规情况下,它们的客体论元需要通过介词结构或插入动宾之间等方式实现(如“炒张三的鱿鱼、给张三泼冷水”),经济性低于动宾构式,似乎同样存在着进入动宾构式的动因。然而,对 BCC 多领域语料库的检索发现,上述三音节惯用语带宾的用例,仅在微博语料中发现 1 例“拍马屁”带宾,可能是个人偶然使用。同时,冯胜利(2002)指出,一般动宾结构再带宾语的现象也仅限于动宾结构为双音节时,三音节动宾短语同样不能带宾语,如“收徒(\*弟)山神庙”。可见,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现象,未能完全扩展到三音节动宾式短语,三音节动宾短语不能带宾仍然是一条较强的限制。

虽然三音节词和三音节动宾短语的带宾限制在韵律语法体系的表述中,均用“核心重音的指派者必须等于或小于最小词”这一“词体条件”进行统一解释(冯胜利 2011)。但三音节动词与三音节动宾短语有着不同的韵律属性。对于“打砸抢、热处理、最大化”等三音节动词,它们均有资格作为复合词。因此,按照冯胜利(2000: 90)的“复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这一论断,具有复合词性质的这些三音节词必然也属于韵律词<sup>[9]</sup>,其语音形式为三音节超音步,属于“超韵律词”,仍然由韵律词法构成。而“炒鱿鱼、拍马屁”及“收徒弟”等动宾短语,是由韵律句法构成的。如冯胜利(2002)所述,它们由于超出了最小韵律模块的限制,不能成为韵律词,从而也不能具有复合词的资格,而只能是短语。二者在韵律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由此可见,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在句法功能上的“大界”,在此仍是基本的结构规则。

因此,根据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认为,限制核心重音指派的“词体条件”实际可以细化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条件:“核心重音的指派者是韵律词”和“核心重音的指派者是最小韵律词”。这两类条件的限制强度有所差异,当其他因素参与互动时表现也有不同。

这两类情况限制强度所存在的差异,源于它们不同的成因。三音节超韵律词的带宾限制,是避免“头重脚轻”的这一韵律层面的倾向性特征所致;而三音节非韵律词的重音指派限制,则是由于在韵律的作用下,它们无法形成一个“词”因而只能是短语,因此不具有以整体的身份进行重音指派的资格,其重音指派只能由其动词指派给内宾语,当然无法再次向外宾语指派重音,这一限制,属于韵律对句法运作的制约这一更高的层面,因此,三音节非韵律词作为短语,与动宾构式的限制条件有着更强的冲突<sup>[10]</sup>。

## 6 余论

先前的韵律语法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在典型现象中,韵律对句法、词法的限制作用。而本文所考察的三音节动词带宾这一现象,其生成动因和机制涉及韵律因素与句法语义因素作为竞争因素的互动。由此可以观察到韵律因素对句法语义因素起作用的

限度,动宾构式中作为形式条件的韵律条件与其意义的互动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韵律语法的研究提供新的认识角度。

目前,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在当代汉语中尚属一种边缘现象。而在构式语法理论中,边缘现象正是理论所关注的“核心”现象,因为边缘现象受到的制约因素最多,界面互动因素最为复杂。(施春宏 2015b)而对边缘现象的“理论中心化”考察,是认识语言系统中不同因素的作用条件,进而对“典型”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说明的重要途径。

## 注释

- [1] 王伟超、施春宏(2018)对当代汉语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做了详细的材料梳理,收集到的各类用例共 216 例。本文重在对这一现象做出阐释,故为了行文简洁,本节只是基于大的类别列陈相关现象,部分用例是本文首见;更多的用例及数据统计,请参见该文。
- [2] “安乐死”一词作为动词,较常规的用法是及物用法,如:“沈若鱼说,那我就安乐死。”(毕淑敏《红处方》)但在当代汉语中,该词也出现了不及物用法,如:“美国最大的动物保护组织‘人道协会’……便把一只 9 个月大的小猫安乐死。”(BCC 微博语料)其论元结构与带宾用法的“安乐死”一致。
- [3] 在 BCC 多领域语料库中,未检出“对……进行短消息/潜规则/黑名单”的用例。其中,“潜规则”的动词用法趋向固定化,故“对……进行潜规则”的可接受度稍高。
- [4] 在以词为单位进行组块分析时,“瞬时块数”即语言处理进行到某个词时,从句首到该词之间存在的无法继续组合为更大的短语的句法单位数目。例如,在“他们妖魔化中国”中,处理到“妖魔化”时,“他们”和“妖魔化”不能直接组成短语,故瞬时块数为 2,而处理到“中国”时,“妖魔化”与“中国”组成动宾短语,并进一步与“他们”组成一个主谓短语,故瞬时块数为 1。“平均块数”为处理到各词语时“瞬时块数”的平均值。
- [5] 该文中的“语体”是从文章体裁进行分类的,而文体、文类不等于语体。更合适的理解应该是,在语体语法的系统中,典型的公文、政论多含正式语体特征,而日常口语基本体现为非正式语体特征。当然,该文对文类的统计数据大体能够说明“对”字句的语体属性。
- [6] 同时,这两例均不凸显结果,因此也不能使用“把”字句将受事论元前置。
- [7] 为确保这些“化”缀词在语义结构上的同质性,此处词语的选取未包括“格式化”等语义专门化的专业术语,总条数在语料库总用例数的基础上去除字面偶然同形的用例。
- [8] 图中显示“最大化”在改革开放前的某些年份出现了一些用例,但经检索,这些用例多为字面偶然同形(如“最大化学公司”),在 BCC 语料库“历时检索”的统计范围内,改革开放前“最大化”一词的用例只有 1963 年的 1 例。
- [9] 韵律句法学认为“1+2”结构不能构成韵律词,但“热处理、性骚扰”等“1+2”式三音节动词在语法上完全具备复合词的属性,句法规则无法对其内部成分进行操作。故它们也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通过韵律词法造出的韵律词。这些韵律词的形成可能具有其他层面的原因,本文不拟

讨论。

- [10] 同时,三音节动宾短语较少存在外语的影响,且使用“给”等介词提前或插入动宾之间的方式配置客体论元时,形成的是非正式语体或中性语体的句法格式。这些方面与三音节动词不同,也使得三音节惯用语少了一些促动它们进入动宾格式的动因。

## 参考文献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Illino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董秀芳 1998 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语言研究》,第1期,55-62页。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 2001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当代语言学》第3卷第3期,161-174页。
- 冯胜利 2002 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国语文》第6期,515-524页。
- 冯胜利 2009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11 韵律句法学研究的历程与进展,《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3-31页。
- 冯胜利 2012 语体语法:“形式-功能对应律”的语言探索,《当代修辞学》第6期,3-12页。
- 郭 潮 1982 “化”尾动词的语法特点,《汉语学习》第3期,32-37页。
- 李 巍 2016 当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现象研究——基于《汉语动词用法词典》的考察,《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1期,148-153页。
- 刘经建 1994 三音节“化”缀动词浅析,《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2期,13-16页。
- 陆丙甫、蔡振光 2009 “组块”与语言结构难度,《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3-16页。
- 罗红昌 2009a 动宾结构中单双音节选择的弹性,《宜宾学院学报》第11期,76-79页。
- 罗红昌 2009b 汉语单双音节选择与优选模式,《语言科学》第8卷第3期,317-325页。
- 施春宏 2010a 从句式群看“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291-309页。
- 施春宏 2010b 语言学规则和例外、反例与特例,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编《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第六届对外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94-317页。
- 施春宏 2012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当代修辞学》第1期,1-17页。
- 施春宏 2014 “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当代修辞学》第2期,1-11页。
- 施春宏 2015a 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不对称分布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25-44页。
- 施春宏 2015b 边缘“把”字句的语义理解和句法构造,《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53-66页。
- 王伟超、施春宏 2018 当代汉语三音节动词带宾现象类例考察,《韵律语法研究》第3辑第1期,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待刊。

张云秋 2002 “化”尾动词功能弱化的等级序列,《中国语文》第 1 期, 50-54 页。

赵 旭、侯振平 2014 准双向动词扩展的制约因素——动词与句式互动的个案思考,《中国语文》第 2 期, 149-156 页。

周 韧 2010 论韵律制约句法移位的动因和手段,《世界汉语教学》第 24 卷第 1 期, 18-25 页。

(王伟超 mijiag@163.com;施春宏 shichunhongblcu@163.com)

## Th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Tri-syllable Verbs with Objec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ANG Weichao SHI Chun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tri-syllable verbs followed by objects such as “*yāomóhuà Zhōngguó* (妖魔化中国)”, “*qiánguīzé nǚ míngxīng* (潜规则女明星)” and “*chuánbāngdài qīngnián jiàoshī* (传帮带青年教师)”. Although tri-syllable verbs with objects violate the restriction of stress assignment in prosodic syntax, they are developing new expres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rstly, based on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n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its formativ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four factors, that is, uniformization of form-meaning pairing, econom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ccordance, and influences of expressions in foreign languages, are motivating the emergence of tri-syllable verbs followed by obj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chanism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related to multi-interface interactions, such as the effects of prosodic factors on semantic/pragmatic ones, the counter effects of semantic/pragmatic factors on prosodic ones, and the readjustment process between prosody and morphology.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pansion constraint of this phenomenon, which paves the way to points out that the analysis of marginal phenomena has specific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ri-syllable verbs;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prosodic syntax; interaction;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